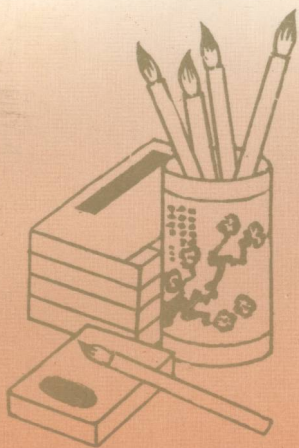


诗经引论

滕志贤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滕志贤 著

诗经 引论

江苏教育出版社

《诗经》引论

滕志贤 著

责任编辑 王许林

出版发行：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丹阳人民印刷厂
丹阳市新民中路 187 号，邮政编码：2123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625 插页 5 字数 219,6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343—2894—2

G·2617

定价：12.20 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徐 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选集，其文化内涵极其丰厚，因此被列为研习中国文史者必读源头书之一。余早年从章太炎先生受经、史、小学，知《诗经》源流及其演变，复饴闻马瑞辰、胡承珙、陈奂三家《诗》说，考证虽详尽，学者亦粹难理解，其书之难读可以想见。

为了帮助初学者研习《诗经》，几十年来，有专家写过一些《诗经》学方面的专著，但内容或偏重经学研究，或偏重文学赏析。本书作者滕君志贤认为，研习《诗经》，当从精读原著入手。分析《诗经》难读的原因，主要在语言古奥和诗旨难明两端，而诗旨的探寻研核，也离不开训诂研究的深入，因此初学者应以通《诗经》语言为先务。本书总体格局，以阐发《诗经》语言为主，讨论《诗经》基本问题等内容为辅。余喜其学有根柢，能精研《诗》学，故从而奖借之，以为其说不可易。

本书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内容精当，重点突出。本书旨在帮助读者解读《诗经》三百五篇原著，并以此确定内容的取舍和详略。全书九章，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其一，《诗经》基本问题；其二，《诗经》的语言；其三，《诗经》的研读方法。三者皆与研读原著关系密切，其中尤以语言为最，故所占比重亦最大。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阐发《诗经》语言，没有采取专书语言研究的传统做法，未作语言静态描写，而是着重阐发《诗经》语言与古代散文语言的不同之处，并且列举实例，剖析因不明《诗经》语言的特殊性而引发的种种误解。这样写，更经济、更实用，凡具有古代汉语基础的读者，用较少的时间就可以直接掌握

《诗经》主要语言特点,克服常见的语言障碍。作者之苦心孤诣,于此可见一斑。

二、重视研习方法的探索与总结。作为一部《诗经》引论,研习方法的提示自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对此,本书设有专章详论,既有研习方法探索的历史回顾,也有作者自己的研习体会,所论中肯,足供读者借鉴。除了总论《诗经》研习方法以外,作者对各专题的具体研究方法也极为关注,这在第一章阐述《诗经》若干基本问题时表现尤为突出。对那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作者在扼要介绍来龙去脉以后,把论述重心放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评述上面,指出它们的优劣得失。其意义超越了问题研讨本身,对于启迪读者思路、提高读者的思辨能力和研究能力是大有裨益的。

三、平实严谨,实用性、学术性融为一体。历代《诗》说,歧义纷繁,爬罗剔抉,绝非易事。作者对于分歧繁复的旧说新解,善于参稽会通、考量得失,或择善而从,或补苴辨正。其存心平实,识见独运,颇见功力。作者执教南京大学,以绩学闻,顾淡泊名利,潜心读书治学,而尤研精《诗》学。他对清代乾嘉学派《诗经》学家马瑞辰、陈奂等人的研究有开拓之功。撰有《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质疑》、《陈奂〈诗毛氏传疏〉简论》、《试论陈奂对〈毛诗〉的校勘》、《诗义新探》等《诗》学论文;校点了百万字的《诗毛氏传疏》(即出);《诗》学专著除本书外,目前正在应约撰著《诗经新译读本》。其《诗》学研究,根基扎实,富有创获。如论马瑞辰破通假字是非互见,论陈奂“活校”《毛诗》得失参半,谓《邶风·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为反诘句,辨正《小雅·正月》“彼求我则”句朱熹误释等等,皆信而有征、能成一说者。又其书学术气息浓重,但能与实用性融为一体,深入浅出,尤便于学者,至为可贵。

日前,志贤以《引论》一书清样来,阅后甚当余心,爰缀数语以为之序。甚愿《诗》学之昌明有期,也算是功德无量了。

1996年9月于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序	徐 复 1
第一章 《诗经》概说	1
第一节 《诗经》的性质	1
第二节 《诗经》的创作时代	6
第三节 《诗经》的采集地域	9
第四节 《诗经》的文化价值	12
第五节 《诗序》的作者与价值	15
第六节 关于新出土阜阳汉简《诗经》	21
第七节 《风》、《雅》、《颂》的划分标准	23
(一) 以作品功用划分	23
(二) 以作者和作品内容划分	24
(三) 以声调划分	25
(四) 以地域划分	27
第二章 《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	29
第一节 相辅相成的赋、比、兴	29
(一) 说比	29
(二) 说兴	35
(三) 说赋	40
第二节 多采而完备的修辞体系	46
(一) 对偶	47
(二) 顶针	48
(三) 层递	50

(四) 排比	53
(五) 示现	54
(六) 夸饰	55
(七) 借代	57
(八) 委婉	58
(九) 呼告	59
(十) 警策	61
第三章 《诗经》的句法与章法	63
第一节 上古汉语句法特点在《诗经》中的反映	63
(一) 《诗经》中的判断句	63
(二) 《诗经》中的叙述句	64
(三) 《诗经》中的否定句	66
(四) 《诗经》中的疑问句	67
(五) 《诗经》中的主谓结构	68
(六) 《诗经》中的词类活用	69
第二节 《诗经》诗句的语法分析	71
(一) 诗句具备主语、谓语,相当于语法上的单句	71
(二) 诗句相当于单句中的一个语法成份	72
(三) 诗句仅相当于单句某一语法成份的一部分	72
(四) 诗句仅是外位语	73
(五) 诗句相当于一个紧缩复句	73
(六) 诗句是构成复句的分句	74
第三节 《诗经》的四言句与非四言句	75
(一) 非四言句的字数	75
(二) 非四言句在《诗经》中的组合	77
(三) 非四言句的作用	77
第四节 《诗经》的章法	78
第四章 《诗经》常见语言障碍	82

第一节	通假字与望文生训	82
第二节	古义词与以今释古之误	86
第三节	句字增添与实解衬字之误	89
第四节	句字省减与误解句意	101
第五节	倒文与以倒为顺之误	105
第六节	变文与以变为正之误	112
第七节	互文与孤立分解之误	114
第八节	反诘与不辨反诘之误	119
第五章	《诗经》的韵律	122
第一节	韵在诗句中的位置	122
第二节	韵在诗章中的疏密	124
第三节	韵在诗章中的转换	126
第六章	《诗经》的校勘	130
第一节	汉代郑玄的校勘	130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诗经》校勘	133
	(一) 陆德明的校勘	133
	(二) 颜师古的校勘	134
	(三) 孔颖达的校勘	134
第三节	宋代的《诗经》校勘	136
	(一) 朱熹的校勘	136
	(二) 王柏的校勘	139
第四节	清代的《诗经》校勘	140
	(一) 顾广圻的校勘	140
	(二) 陈奂的校勘	143
第七章	《诗经》古注的体例	150
第一节	释词的体例	151
	(一) 释名词例	151
	(二) 释动词例	152

(三) 释形容词例	152
(四) 释助词例	153
(五) 表明词类活用例	154
(六) 表明通假例	155
(七) 探求语源例	156
第二节 析句的体例	157
(一) 补足省减的句子成分例	157
(二) 理顺倒文例	159
(三) 表明句读例	160
第八章 《诗经》的研读方法	162
第一节 《诗经》难读的原因	162
第二节 《诗经》研读方法的历史回顾	163
(一) “以意逆志”法	163
(二) 以《诗序》、《毛传》为本法	165
(三) 涵泳篇章、寻绎文义法	165
(四) 胡适的“两条路”法	167
第三节 研读《诗经》的几点意见	167
(一) 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	169
(二) 善于利用历代《诗经》训诂成果	171
(三) 要了解《诗经》语言的特殊性	172
(四) 广泛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 开拓《诗经》训诂研究新境界	173
(五) 坚持严谨求实的学风	173
第九章 《诗经》的传播和研究史略	175
第一节 《诗经》在先秦的传播与异化	175
(一) 采《诗》、献《诗》与《诗》的功利化	175
(二) 赋《诗》言志与断章取义	177

(三) 孔门《诗》教与《诗》的教条化	181
第二节 两汉《诗经》经学地位的确立与三家诗、《毛诗》之争	186
(一) 秦火后《诗经》的复生	186
(二) 三家诗先立学官	187
(三) 《毛诗》后来居上	189
(四) 宗《毛》为主兼取三家的《郑笺》及其贡献	191
第三节 汉代以后《诗经》研究的沿革	194
(一) 魏晋王学、郑学之争与唐代《毛诗正义》一统天下	194
(二) 宋代《诗经》研究的革新及其代表作《诗集传》	195
(三) 清代《诗经》研究对汉学、宋学全方位的继承与发展	197
〔附录一〕《诗经》古今字、通假字例释	202
〔附录二〕《诗经》研读参考书分类举要	258
后记	267

第一章 《诗经》概说

第一节 《诗经》的性质

如果把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比作奔腾不息、气势恢宏的大江长河，那么，产生于 2500 年前、在上古三代文化积淀基础上形成的《诗经》就是它的光辉源头。

《诗经》以其如椽华笔为中国诗歌史、文学史谱写了光彩夺目的第一章；它以丰沛甘醇的乳汁，哺育了屈原、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欧阳修等一代又一代诗圣文豪；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诗经》被尊奉为儒家经典，作为重要的教化工具，对政治、社会生活产生过巨大影响。因此，它被誉为“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①之一。

《诗经》研究长盛不衰，这部象征中国古老文明的不朽著作，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方热土。

研究《诗经》，首先要了解它的性质，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关于《诗经》的性质，从古到今，主要争论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儒家经典还是文学著作？二、是古代诗歌总集还是选集？三、《诗经》是否全部入乐？以上三个问题，有的已经基本解决，有的意见还没有完全统一。

^① 见王余光主编《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一、《诗经》是儒家经典还是文学著作？

《诗经》在封建时代被定性为“经”，而不纯是文学作品，这从它的名称上就可以得到印证。所谓“经”，就是儒家认定的经典。按照儒家观点，《诗经》就是古代圣贤假托农耕征战、男女情爱以及寄兴风花雪月进行教化的思想政治教材。

在上古文献中，《诗经》起初还只是单称《诗》，但不久就被戴上了“经”的桂冠。《庄子·天运篇》首次把《诗》纳入“六经”。它说：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到了西汉，“诗”与“经”更是直接连为一体，《史记·儒林传》云：“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就是较早的一个例证。

《诗经》之为“经”，不过是儒家强加给它的特殊功能，它的鲜明的文学特征是任何人没有办法掩盖的，儒家的定性无异于指鹿为马。所以早在南北朝时，刘勰《文心雕龙》就已经用经学和文学双重标准来评析《诗经》。宋代开始，怀疑《诗经》是“经”的人多了起来，但因为汉代以后“经”的意识不断强化，在强大的封建舆论面前，疑“经”的声音显得十分微弱。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接着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又向封建文化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作为封建文化基石的经学理所当然成为清算的主要目标。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人物胡适明确提出“《诗经》不是一部经典”，“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谈谈诗经》）。尽管“歌谣总集”的概念不够确切，但他对《诗经》本质的揭示无疑是基本正确的，现在除了少数坚持认为《诗经》是经书的学者以外，《诗经》是文学作品的观念已经得到普遍认同。

二、《诗经》是中国最古的诗歌总集还是诗歌选集？

这个问题历来认识有分歧，至今尚没有定论。

上面我们提到，胡适给《诗经》下的定义“古代歌谣总集”不够

确切。有人指出,《雅》、《颂》并非歌谣,所以“歌谣”二字后来就被“诗歌”所取代,但是“总集”这个概念却被沿袭了下来。

鲁迅给《诗经》下的论断与胡适有所不同,他说:《诗经》“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诗选”(《集外集·选本》)。又说:“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王官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目前,“总集”说的影响显然超过“选集”说,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呢?

胡适虽然第一个提出“总集”说,但他并没有进一步提出有力的根据。

主张“选集”说的人往往以《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作为论据,然而此说也无从证实,只好暂搁一边。

下面两点对判断是非或许有所帮助:

第一,清代朱彝尊《经义考》引卢格之说曰:“西周盛时,环海内而封者千八百国,使各陈一诗,亦千八百篇矣。”西周是否确有1800个封国可另作考证,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500年间,在如此广袤的地域只产生了305首诗(平均一年一首都不到!)实在从情理上说不过去,所以卢格的怀疑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

第二,《左传》、《国语》等先秦旧籍有逸诗,这是不争的事实。像《左传·隐公元年》姜氏母子所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在《诗经》里就找不到它的踪影。尽管目前发现的逸诗只有几十首,但正可以证明鲁迅所推断的被王官们“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鲁迅所作的《诗经》“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诗选”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三、《诗经》是否全部入乐?

《诗》三百篇本来都是入乐的,换句话说,《诗经》本是乐歌,它是供人们在音乐伴奏下演唱的歌辞,与后世诗歌只能吟诵有所不

同。《诗经》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从许多古籍的记载上可以得到证明。如：

（一）《墨子·公孙篇》：“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二）《荀子·劝学篇》：“《诗》者，中声之所止也。”

（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为之歌《邶》《鄘》《卫》……为之歌《王》……为之歌《郑》……为之歌《齐》……为之歌《豳》……为之歌《秦》……为之歌《魏》……为之歌《唐》……为之歌《陈》……自《邶》以下无讥焉……”

（四）《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五）汉·郑玄《六艺论》：“《诗》，弦歌讽谕之声也。”

但从春秋晚期以后，《诗》三百篇逐渐脱离音乐而独立存在，尤其是当它演变为儒家经典以后，经师们都着眼于阐发它的微言大义，于是《诗经》的音乐性就渐渐被一般人淡忘。一直到宋代，大约受到乐府的启发，人们便开始从理论上探讨《诗》与乐的关系。如郑樵《通志·乐略·正声序论》云：

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仲尼编《诗》，为燕享祭祀之时用以歌，非用以说义也。古之《诗》，今之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不幸腐儒之说起……以义理相校，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

因为《诗》与乐的关系问题涉及《诗经》的起源、编订、体例、章句结构等诸多方面，所以引起古今《诗经》学家广泛关注，争论也随之而起。

《诗经》是否入乐，本来无须争论，因为古书上的记载谁都无法否认。但《诗经》全部入乐还是部分入乐，争论很激烈。宋代程大昌在《诗论》一书中首先提出：“《南》、《雅》、《颂》为乐诗，而诸国之为

徒诗也。”所谓“徒诗”，与“乐诗”相对，指没有音乐伴奏的诗歌。他的主要理由有两条：一条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记乐工所歌只“单举国名”，后面未附“风”字，于是断言自《邶》以下十三国之诗“直以徒诗系之本土”。另一条是在《仪礼》中的《乡饮酒礼》、《乡射礼》里，入乐之《诗》皆不出《南》、《雅》之外。这两条理由都有点钻牛角尖的味道，更何况还有漏洞。《左传》里明明有“是其《卫风》乎”一句，《乡饮酒礼》中也明明有“乡乐唯欲”一句，《仪礼·燕礼》郑玄注：“乡乐者，《风》也。”但是程氏却一概视而不见。令人费解的是，程氏并不高明的论说竟会引起不小的反响。宋代朱熹、明代焦竑、清代顾炎武等著名学者都附和其说，甚至还有所发展，但都拿不出有力的证据。程大昌及其附和者的学说遭到清儒全面反击。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诗入乐说》、俞正燮《癸巳存稿·诗入乐》、皮锡瑞《经学通论·论〈诗〉无不入乐〈史〉〈汉〉与〈左氏传〉可证》等文，列举《尚书》、《墨子》、《左传》、《毛诗序》、《史记》、《郑志》、《汉书》、《晋书》等大量证据^①，驳斥程说，证明《诗》三百篇无不入乐。今人顾颉刚，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撰长篇专文《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突破以钩稽旧典为主的传统论证模式，从比较春秋时期徒歌与《诗》三百篇形式结构异同入手，用求内证法证明《诗经》全部入乐，令人耳目一新。该文方法科学，说理透彻，为这场延续了数百年的关于《诗经》音乐性的论争作了全面总结。八十年代初，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②为《风》《雅》构拟出具体曲式，《诗经》全部入乐说又一次得到有力证实。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诗经》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约 500 年间的周代诗歌凡 305 篇，它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一部诗歌选集，其所录诗歌全部入乐。

① 其中《墨子》、《左传》等主要书证已具列于前，此不赘引。

② 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这个结论来之不易，它是古今学者对《诗经》本质经过千百年不断研究、反复思辨的结果。它标志着《诗经》研究终于挣脱了经学的绳索，走上了科学的康庄大道，无论对《诗经》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节 《诗经》的创作时代

孟子说：“诵《诗》读《书》，曰论其世。”就是说，研读《诗经》、《书经》（当然也包括其他文献）应当把它们的时代背景搞清楚，如果时代背景不明，一切研究就无从谈起。

古人对《诗经》的时代问题很重视，东汉郑玄据太史年表及《春秋》编纂了《诗谱》，“列诸侯世及《诗》之次”（《诗谱序》孔疏），欲寻绎《诗经》各部分的时代先后次序，但《诗谱》今已残缺，不得睹其全貌。清代《钦定诗经传说彙纂》有《作〈诗〉时世图》，以图表形式将三百篇依时代先后排列，自商太甲之世至周定王之世共 22 世。其编排的根据是“古《序》及毛、郑、孔氏等旧义，而大指仍以朱子为归”。由于它是彻头彻尾的以史证《诗》，穿凿附会的地方比比皆是，所以信之者寥寥。

研究《诗经》的时代，难度比较大，通常都是利用一些蛛丝马迹来推测。主要的方法有下面四种：

（一）从诗歌作者推测。

《诗经》有少数诗篇标明作者名字，其中有的可以在史书上得到印证，我们就可以据此而推测作品的年代。如《鲁颂·閟宫》末章云“奚斯所作”，奚斯是鲁国大夫公子鱼的字，见于《左传·闵公二年》。奚斯是鲁僖公同时代的人，因此《閟宫》也应当是僖公时的作品。但是，《诗经》标出作者名字的作品总共只有 5 篇，涉及作者仅 4 人，其中像《小雅·巷伯》的作者“寺人孟子”根本无法查考，所以这种方法的作用极为有限。

（二）从诗歌内容推测。

如果诗中提到重要的历史人物，这是十分有价值的线索。如《曹风·下泉》有“四国有王，郇伯劳之”句，郇伯即晋大夫荀跖，他曾率兵护送周敬王入王城，事在公元前516年。《下泉》诗正是赞美荀跖此举，因此当作于公元前516年之后。

诗中如涉及历史事件，也有助于推断作品的时代。如《鄘风·载驰》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这显然是指卫国亡于狄、渡河暂居漕邑、许穆夫人欲往慰回事。因此，本诗写成时间大约在卫文公元年（公元前659年）。

用历史人物推测作品年代要谨慎从事，特别对那些歌功颂德的祭祀诗尤其要当心，因为相隔年代久远的子孙同样可以颂扬先祖。如《鲁颂·閟宫》系春秋鲁僖公时的作品确定无疑，但作品中赞颂了姜嫄、后稷、大王、文王、武王等周族先祖，如果据此而遽以为此诗作于西周早期就大错特错了。

（三）从诗歌形式上考察。

诗歌形式包括遣词造句、布局用韵等等。如《周颂》31篇，每篇都只有一章，而且不押韵，与其他《颂》诗及《大雅》相比，显得更为简单质朴，所以一般认为属于西周早期诗歌。诗歌发展总的趋势是由简至繁，由质至文，用这个规律可以大致研判《颂》、《雅》、《风》各部分的时代先后。

（四）从先秦典籍提供的信息推测。

先秦典籍，特别是《论语》、《左传》、《孟子》、《荀子》等保存了一些与《诗经》有关的资料，有的可以拿来作为推测年代的参考。如《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两则资料表明《诗经》制作时代下限应在春秋时期。又如，《左传·文公二年》：“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引《诗》出自《大雅·桑柔》十三章。芮良夫是周厉王时卿士，